



责编/范亚湘 美编/何朝霞 校对/刘芳

迟早是亡国灭种！难道我们要做亡国之臣？”他的话如重锤砸在众人心中，越来越多的人拿起笔，在联名书上签下名字。

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4月22日，康有为、梁启超召集千名举人在松筠庵集会，随后集体上书都察院。张百熙身为朝廷官员，虽不直接参与举人的请愿，却暗中联络翰林院同僚，在朝中为上书造势。当都察院以“和约已定”为由拒绝接收上书时，他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质问：“君父有难，百姓泣血，我辈竟连进谏的门路都没有？”这番话让慈禧不悦，却也让更多官员看清了张百熙的风骨。

公车上书虽未成功，却如惊雷般震醒了沉睡的朝野。张百熙彻底明白：仅靠修补旧制已无法救国，唯有根本性变革才能挽回颓于既倒。他从恪守旧制的传统士大夫，转身成了矢志新政的改革者。

三年后，光绪皇帝颁布“明定国是”诏书，戊戌变法的浪潮席卷朝野。张百熙时任翰林院内阁学士，连夜写就奏疏，痛陈科举之弊：“科举以八股缚人才，士子皓首穷经却于时事懵然，若不废之，国之将亡，无有日矣！”他恳请光绪帝“广立学堂，延聘西师，开民智以御外侮”，并荐举康有为为经济特科。

张百熙与康有为的相遇，是变法中的一段佳话。在强学会的秘密聚会上，康有为的《新学伪经考》引发争议，有人斥其“离经叛道”，唯有张百熙猛地拍案，声震屋瓦：“推倒汉学壁垒，直探孔孟本源，康先生此著，如惊雷破蒙！”两人秉烛夜谈，从西学制度聊到教育革新，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。后来康有为在《自编年谱》中写道：“百熙目光如炬，言及教育，泪落数行，知其必为中国教育开新局者。”

维新不过百日便遭腰斩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，康梁流亡海外。张百熙因曾举荐康有为，被御史参劾“附和康党，倡言变法”。幸得荣禄进言：“百熙办事踏实，与康党无涉，唯求治国而已”，才得以免于重惩，最终以“滥保康有为”之罪革职留任。那几日他闭门不出，案头的《天演论》翻得边角发皱，手指反复摩挲“物竞天择”四字，泪水落在纸页上晕开墨痕。有人劝他收敛锋芒，他却拂袖一笑：“我若不言，谁为天下苍生言？”

戊戌变法的起落，让张百熙更确信：教育革新是国家自强的根本。此后他四处游历，考察西方教育制度，为日后的改革积蓄力量。正如历史学者茅海建所言，张百熙是戊戌变法中最坚定的温和改革者——这份“温和”并非妥协，而是在政治漩涡中懂得保全火种的智慧。不久后，清末新政的浪潮里，他终于得以施展抱负，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奠基者之一。

“你这三问，足可让这些孩子记一辈子。”张百熙望着台下年轻而充满朝气的面孔，忽然想起二十年前在长沙城南书院的自己，眼眶不禁湿润——他知道，自己点燃的这簇火，终将燎原。

每周日下午，张百熙都会在大学堂的“时务斋”与学生亲切座谈。一次讨论“民权”问题时，学生王国维激动地说：“今日中国之弊，在君权太重！”保守派学生立刻起身反驳：“尔等竟敢非议君父，是要谋反吗？”张百熙却摆摆手，和蔼地说道：“学问之道，贵在争鸣。王国维所言虽有过激，然‘民权’二字，非洪水猛兽，乃西学中‘民为邦本’之意。”他随即取来《孟子》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，此非中国古训乎？一场剑拔弩张的争论，最终变成了对中西政治思想的深入探讨。

除创建京师大学堂(北京大学前身)，张百熙还力主废封建科举，创建新制学制。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七月，他亲自主持拟定一整套包括《小学堂章程》、《中学堂章程》、《高等小学堂章程》、《大学堂章程》、《师范学堂章程》、《实业学堂分农工商三类》的核心设计，还明确了初、中、高三级教育的分段，奠定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石。当张之洞在奏折中写下“臣等公同商酌，损益百熙原章”时，63岁的张百熙在案头写下《夜改学制》：“笔底波澜混迷茫，百年教育存存亡。”

张百熙的务实，更体现在对实用人才的看重。他向清廷上《奏派学生赴东西洋各国留学折》，这成为中国以官费派留学生的始端。随后他主持派出47名留学生，这47人中，如冯祖荀、何育杰、俞同奎、张耀曾等均成为各自领域开宗立派的大家。后来张百熙逝世时，这些留学生集合祭奠，无不失声痛哭，哀悼良师。

张百熙力主在京师大学堂开设译书局、铁路科，亲自邀请詹天佑参与课程设计。两人在颐和园的游廊下长谈，詹天佑提出“先建一段实铁路，让学生亲手操作”，张百熙立刻拍板支持：“学西学不是为了空谈，要让学生亲手摸得到机器，才叫真本事！”后来詹天佑主持修建京张铁路，张百熙又以邮传部尚书的身份，为他协调经费、排除阻力。詹天佑晚年回忆：“若没有百熙公的支持，京张铁路的开工不知要晚多少年。他懂教育，更懂强国的根本在实干。”

武

清朝光绪二十年(1894年)，黄海海战的炮声撕裂了世上虚假的和平。那夜他辗转难眠，中夜披衣坐起，案上烛火被风卷得摇曳，映得他泪痕斑驳的脸忽明忽暗。他磨墨提笔，以内阁中书的身份疾书弹劾奏折，字字如刀，认为李鸿章“壹意以成事为非，并不督伤诸军实力进剿，致使倭人逐日布置，逐段增兵。即勇敢善战如左宝贵、夏士成等，亦顿兵韩境，进退失据。”

早朝之上，慈禧将那份奏折“啪”地掷在李鸿章面前，李中堂面如死灰，伏地不起。张百熙立在丹墀之下，声如洪钟：“臣请查北洋军费流向！请斩丁汝昌以谢天下！”军机大臣刚毅厉声呵斥：“小臣妄敢妄议军国大事！”张百熙抬眼回望，目光如炬：“刚毅大人可知，威海卫炮台的炮弹，实心弹几何？开花弹又几何？”话音落下，金銮殿上一片死寂——这一问，戳穿了清朝军备废弛的遮羞布，也问出了满朝文武的难堪。

退朝后，张之洞的密信连夜送到张百熙所在的翰林院：“君之直，堪比海忠介，然海公生嘉靖朝，尚得全身，今庙堂昏暗，恐直道难行。”张百熙提笔蘸墨，在宣纸上写下八个字：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。”墨迹未干，便命人送回。他未曾料到，这份刚烈将在十年后让他付出沉重代价，却也注定了此后的人生轨迹。

光绪二十年(1894年)甲午海战的确尚未散尽，次年暮春，北京的风里还挟带着料峭寒意，翰林院朱红的廊柱下，一个传报差跌跌撞撞冲进仪门，手里的邸报被风掀得哗啦啦乱响：“割辽东、台湾，赔银两亿，开沙市、重庆……《马关条约》草稿传回来了！”

原本浸在古籍校勘声里的翰林院瞬间炸开。几个伏案的编辑猛地抬头，墨汁滴在泛黄的书页上，晕开一团暗褐的污痕。张百熙指节早已攥紧《论语》泛出青白，待听清那几句，猛地拍案起身——长衫下摆扫过案上端砚，浓黑的墨汁“哗啦”泼在青石板上，晕开一片刺目的暗褐，竟似未干的血痕。

“荒唐！此约一签，国将不国！”文廷式的嘶吼先撞进耳中。张百熙快步走到厅中，目光扫过诸人面如土色的脸，字字砸在地上：“我等食君禄、负民望，岂能坐视江山被拆、生民遭殃？”

说话间，文廷式已抓过宣纸，提笔蘸墨写下“拒和变法，以挽危局”八个字，笔锋力透纸背，每一笔都似携着悲愤。有人红着眼眶抢过笔，蘸墨的手直抖：“拼了这顶戴，也要上书请战！”却也有老儒抚着白须喟叹：“北洋水师都沉了，拿什么战？”张百熙猛地转头看向他，眸子里是痛心的火光：“不战是任人宰割，今日割辽东，明日割中原，

叁

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冬，京城被一场格外盛大的雪覆盖。新任管学大臣张百熙踩着厚厚的积雪，第三次来到桐城派大师吴汝纶的宅邸前。为请这位时年63岁的教育家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，他身着朝服，长跪于青石板上，声泪俱下地说道：“先生不出，如中国何？”

雪花纷纷扬扬落满他的顶戴花翎，融化的雪水顺着补服的褶皱蜿蜒而下，浸透了朝靴，膝盖传来刺骨的寒意，他却不敢挪动分毫。他想起甲午战败的屈辱，想起京师大学堂荒废的校舍，比起国家的未来，个人的尊严又算得了什么？吴汝纶隔窗望见这个比自己小17岁的朝廷命官，顶戴积雪如白头翁，终于长叹一声，缓缓打开大门：“百熙公，你这一跪，跪的不是我，是中国的未来啊！”

两人在暖阁中彻夜长谈，吴汝纶提出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办学方针，张百熙却认真补充道：“体用之说，当如人之两足，缺一不可。若中学为体而西学为用，则如跛足而行，终难致远。”他拿出草拟的《京师大学堂章程》，其中“兼容并包，广纳众流”八字，后来成为北京大学精神的源头。

张百熙的诚心与远见，吸引了海内外诸多学者云集京师大学堂：翻译家严复主讲西学概论；名士屠格山、王瑞舟讲授经史；蔡元培也曾在此短暂行教。甚至连特立独行的辜鸿铭，也被张百熙的包容所打动。辜鸿铭初入大学堂时，因留着辮子、穿长袍马褂被同学嘲笑“守旧”，张百熙却在公开场合说道：“辜生之辮，辮于发也；若诸君之辮，辮于心，则更可忧。”他欣赏辜鸿铭的西学功底，亲自安排他教授英国文学，还常与他探讨“如何用英文讲好中国故事”。后来辜鸿铭在《中国人的精神》中写道：“百熙公教会我，真正的守旧，是守住文明的根；真正的革新，是开出时代的鲜花。”

京师大学堂的筹建并非一帆风顺。选址马神庙时，户部尚书立山以“经费不足”为由，主张将部分校舍改为神机营练兵场。张百熙在朝堂上与立山展开激烈辩论：“练兵需银百万，然十年后兵老力衰；办学需银亦百万，然百年后人才能出。孰轻孰重？”慈禧太后最终拍板：“校舍依旧，经费由内务府拨给。”

为筹措图书仪器，张百熙不辞辛劳，拜访各国驻华公使。英国公使奕纳尔嘲笑：“贵国连像样的大学都没有，办何学堂？”他反唇相讥：“英国牛津建校时，中国已有太学千年。今日中国兴学，正是要追回这百年之落后！”奕纳尔被他的锐气和豪情打动，最终促成大英博物馆向大学堂赠书千册。

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12月17日，京师大学堂举行盛大的开学典礼。张百熙身着一品官服，庄重地站在临时搭建的礼台上，对台下300余名学生提出“三问”：“一曰，尔等为何读书？为功名耶？为家国道耶？二曰，西学浩瀚，当择何者而学？为炫技耶？为致用耶？三曰，今日所学，他日当如何报国？为空言耶？为实事耶？”

学生们群情激昂，齐声高呼“为国家致用，为实事报国”。站在一旁的吴汝纶悄悄对张百熙说：

清标卓立入朝端

常正祥



张百熙的胸膛里，早已装着顶天立地的家国抱负。

他也记得同治七年(1868年)的挫败：二十一岁的他第一次赴京会试，因在策论中痛陈“漕运积弊”言辞切直，触怒主考官而名落孙山。归乡途中经岳阳楼，偶遇一位贩卖《海国图志》的老秀才，对方望着江面的外国商船长叹：“此书初刻时，林文忠公还在力主睁眼看世界，可如今洋人都跑到家门口了，朝廷却还抱着八股取士不放！”张百熙立刻买下最后一本，在归舟中连夜研读，书页空白处写满了朱红批注，那句“师夷长技，必先启民智”，已在他心底悄然埋下了。

此次赴京会试的前夜，母亲将父亲遗留的祖传端砚交到她手中，语重心长：“你爹生前常说，读书人当如砚石，磨而不磷，涅而不缁。”他跪在母亲膝下，望着堂中“忠勤笃实”的家训匾额，心头一股热流翻涌，暗暗立下誓言：“此生若不能为天下开风气之先，誓不还湘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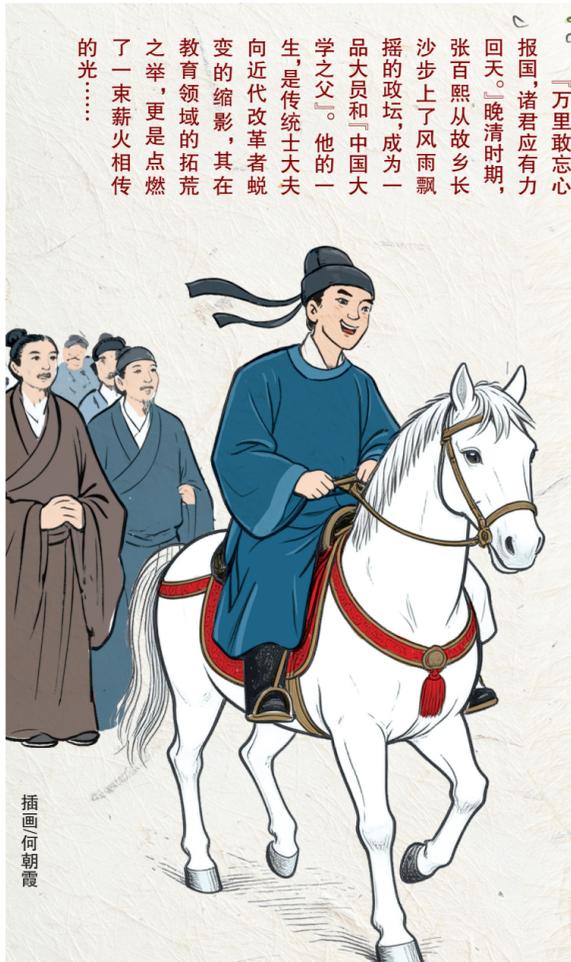
张百熙站在宗祠外的台阶上，祠堂外的百年银杏早已落尽最后一片金叶，嶙峋枝丫在料峭春风里划破铅灰色的天穹。石阶缝隙，几茎枯草挂着未融的冰凌，晶亮模样竟像极了当年离乡时母亲塞进行囊的狼毫笔——那回笔尖的墨汁在寒风里冻成黑晶，正如他此刻胸中，虽有冰雪般的清醒，却藏着一团炽热的火。

“此生若不能为天下开风气，誓不还湘。”走下台阶，张百熙拜别亲友，走进官轿，走向长沙与京都，也走进了晚清政坛那片霞霭飘零的暮色。

此后十余年间，张百熙先后出任国子监司业、山东学政、四川乡试正考官等职。这些经历，让他博览了壮丽奇秀的名山大川，有了“径思小天下，一扫烟尘昏”的博大胸怀，还让他接触了底层社会，目睹了现实的黑暗和百姓的疾苦。他在《自玉屏赴贵阳道中感述一首》中就充分描写了战争所给予百姓的苦难：“浩荡千里中，白骨悲沙场。官私悉破坏，无有完城隍。那堪万家室，鸡犬猪牛羊。杀戮不一存，存者皆流亡。荆棘塞衢路，但多豺与狼。”张百熙也曾赴沿海一带游历，当他隔江遥望香港不禁感慨：“天意捐荒岛，涛头激壮心。圣朝柔远德，感叹一哀吟。”

其诗多为对国耻的沉痛和报国的豪情。当然，这些与教育息息相关的经历，让他“桃李满天下”，如在广东门生中，后来成为近代史中著名人物的，就有叶恭绰、胡汉民、陈炯明、唐恩溥、许之衡等人。但这些经历，更让他得以深入洞悉清代教育制度的运行逻辑与沉痾积弊。尤其是在任山东学政的四年(1881—1884年)里，他亲眼见证了科举制度下士子们“皓首穷经”的悲剧：有人熬白了头发仍困于八股，有人对窗外的世界懵然无知，只懂咬文嚼字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痛惜道：“见士子伏案终日，面如枯蜡，而于时事懵然，心窃忧之。”这份对人才凋敝的忧虑，成了他日后力推学制改革的燎原之火。

城南书院西侧朱熹手书的“忠孝廉节”碑，是他最常驻足的地方。每每凝视那笔力千钧的“忠”字，清朝道光年间岳麓书院学子投笔从戎，奔赴抗英前线的身影便浮现在眼前。一次与同窗郭焯堂(郭嵩焘之子)争论“夷夏之分”，他拍案而起，声震屋瓦：“魏默深先生道‘师夷长技以制夷’，若连正视夷技的勇气都没有，又谁论制夷？”这番掷地有声的话，让郭焯堂一时语塞，也引来了一束薪火相传的光……



插画何朝霞

“张老爷高中进士，荣归故里啦！张老爷高中进士，荣归故里啦！”清朝同治十三年(1874年)三月，春风还裹着料峭寒意，可张氏宗祠内外早已沸天震地，吆喝声随着鞭炮碎屑飘遍街巷，到处一派喜庆的气氛。

族长领着须银飘拂的族中耆老、青衫束带的年轻子弟，身着吉服整肃列队，翘首的目光直望向官道尽头。终于，一辆驮着“进士及第”彩旗的车驾缓缓行来，爆竹瞬间炸响如雷，笙箫鼓乐即刻奏起欢快的乐章。车驾前是一位端坐于高头大马上新科进士，身穿一身簇新、挺括平整的进士公服，头戴一顶雕花展翅迎风微颤的乌纱帽，腰缠玉带，身姿挺拔，眉目间虽有春风得意的昂扬，却又藏着一份异于常人的从容沉稳。

这位新科进士正是字荃秋(一作治秋)、号潜斋的张百熙。此时，他正在族老引导下踏过宗祠前残留的薄雪，乌缎皂靴在雪地上踩下一行清晰而沉实的印记。不过，当他双手捧起御赐的金泥报帖，恭恭敬敬地供于先祖牌位前时；当“进士及第”的金字匾额在雪光映照下熠熠生辉，连堂中祖宗画像的衣袂都似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边时，他或许还未曾料到，自己日后会以“六部尚书”之尊，在晚清帝国沉沉的黄昏里点燃维新改革的希望火种，会以“中国大学之父”的美誉，成为湘湖大地乃至整个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座熠熠生辉的丰碑。

站在众人的注视里，过往的种种在张百熙心头翻涌：他不会忘记六七岁那年的兵荒马乱——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，他随家人仓皇避祸遁入深山，他赤着双脚在刀削般的崖壁间奔逃，虎狼在林间咆哮，那份狼狽与惊悚早已刻进骨血，让他早早读懂了乱世的不堪。正如他后来在《退思轩诗集·归述》所写：“予生属多难，盗贼劫乾坤。六龄遭于戈，蹙蹙湘水滨……仓卒鬻徙来，传阨惊逃奔。巉岩始何代，鬼斧僦云根。”

他不会忘记七岁初入私塾那日，曾官至江西督粮道的父亲张书田手书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横渠四句时，为他叩开了读书人的初心之门；不会忘记清朝咸丰八年(1858年)，年仅十一岁的他参加童子试，笔落惊鸿般考场中生员，在考场考官与士子无不惊叹“此子必成大器”；更不会忘记十六岁考入长沙城南书院时，山长丁取忠在他课卷上郑重批下的“气骨沉雄，有范文正公之风”——他后来将这行字恭录在父亲传下的端砚背面，当成了一生践行的座右铭。

城南书院西侧朱熹手书的“忠孝廉节”碑，是他最常驻足的地方。每每凝视那笔力千钧的“忠”字，清朝道光年间岳麓书院学子投笔从戎，奔赴抗英前线的身影便浮现在眼前。一次与同窗郭焯堂(郭嵩焘之子)争论“夷夏之分”，他拍案而起，声震屋瓦：“魏默深先生道‘师夷长技以制夷’，若连正视夷技的勇气都没有，又谁论制夷？”这番掷地有声的话，让郭焯堂一时语塞，也引来了一束薪火相传的光……

张百熙的一生，是传统士大夫向近代改革者蜕变的缩影，其在教育领域的拓荒之举，更是点燃了一束薪火相传的光……